

商周銘文選注譯

馬如森

自署



# 商周銘文選注譯



馬如森

目署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周铭文选注译 / 马如森著. — 上海 :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671-0403-7

I. ①商… II. ①马… III. ①金文—注释—中国—商周时代②金文—译文—中国—商周时代 IV. ①K87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7196号

策 划 李 旭

责任编辑 庄际虹

封面设计 倪天辰

责任出版 金 鑫 章 斐

### 商周铭文选注译

马如森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7.5 字数 550 千字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3100

ISBN 978-7-5671-0403-7/K·116 定价: 118.00 元

# 李学勤序

东北师范大学马如森教授出自著名学者孙晓野（常叙）先生门下，上承罗王学脉，于甲骨金文造诣甚深，多有著述。日前承他寄示新作《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书稿，嘱我写几句话。追忆1992年，他所著《殷墟甲骨文引论》书成，有胡厚宣、孙晓野先生撰序，我也厕身其间。荏苒近20年，马如森先生将三篇序移录于他这部新作，而胡、孙两先生都已过世，念此不禁感怀系之。

马如森先生这部《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冠以“甲骨文概说”、“金文概说”，发凡起例，作为读者入门阶梯。然后列举有代表性的甲骨九片、金文七篇，循字逐句，细加论析注解，附以语体译文，其深入细致，不厌其详，可谓前所未有。书末还为学习书法者着想，附以精美的临写作品，以作示范。全书设想之周到，工作之详密，体现出马如森先生长达十年的功夫，很值得读者品味。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马如森先生这部书的内容，充分反映了他多年治学谨慎稳重的特点。我认为，这对于初学的读者特别有益。几年前，为纪念王国维先生，我曾有一篇小文登在《中华读书报》，说到王国维先生强调“阙疑”的精神。1924年，王先生为容庚先生《金文编》作序，开篇便讲：“孔子曰‘多闻阙疑’，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许叔重（慎）撰《说文解字》，窃取此义，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阙’。至晋荀勗等写定《穆天子传》，于古文之不可识者，但如其字以隶写之，犹此志也。”至于后世学者，每每失之穿凿，强不知以为知，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正是我辈晚学所应力戒的。

编著甲骨金文知识的普及性读物，更应该如此，向读者介绍的须是已为学术界公认的见解，而不宜一味求新，因为在当前学术繁荣的条件下，新说层出不穷，却不是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介绍公认的知识，并非保守陈旧，而正是稳当矜慎的表现。实际上，细绎《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这部书，大家都会对作者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力有明确的印象。

成语说“金针度人”，是我们都应感谢的。相信这部书的问世，会吸引更多读者对甲骨金文产生兴趣，并由此登堂入室。

李学勤

2010年9月7日

李学勤（1933—）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书是《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的增补本，故将李先生的《序》文，录在书首。（笔者）

## 胡厚宣序

时光过得真快，我学习甲骨文字，不觉已是60多个年头了。回想1928年我中学毕业，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升入本科史学系。那时蒋梦麟任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从广州迁来北平，所长傅斯年兼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当时史学系名教授很多，傅先生自己和史语所的几位研究员，还都在史学系兼课，傅先生开“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李济、梁思永两先生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徐中舒先生开“殷周史料考订”，董作宾先生开“甲骨文字研究”。另外，唐兰先生还教过“古文字学”，商承祚先生也教过“甲骨及钟鼎文字研究”。燕京大学有容庚，辅仁大学有于省吾，清华大学有吴其昌，也都研究古文字、教古文字学。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刘节，研究古文字，还经常收到郭沫若从日本寄来的他出版的甲骨金文新书，并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加以评介。当时除了王国维已经逝世，罗振玉正在东北投奔伪满之外，其余所有的一流甲骨学者，几乎都集中在北平。而且还组织有考古学社，经常在中山公园水榭聚会商讨，甲骨文研究，可谓盛极一时，非常活跃。

可惜那时条件终归还是有所局限。首先是甲骨文发现虽然已经多年，出土材料也有不少，但发表的材料并不很多。孙诒让《契文举例》，所根据只不过《铁云藏龟》一书，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所根据也不过《铁云藏龟》、《殷墟书契》和《戩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等几种著录甲骨的专书。到1934年孙海波出版《甲骨文编》，所根据的资料书，也只有八种，才6417片。

那时机关所藏，往往列为珍品，私人藏家，又常秘不示人，发掘出土的材料，迟迟不能发表，学者也难以使用。对青年来说，书卖的很贵，不要说罗振玉的《殷墟书契》买不起，就连郭沫若的《卜辞通纂》，要买也不容易。《殷墟文字类编》，同学买可以六折，《殷契卜辞》，同学买可以优惠对折，但还是贵。两本薄薄的《邶中片羽》，售价就要银洋20元，对青年学生来说，真是望书兴叹。依赖图书馆，藏书又不定齐全。只好靠抄抄写写，少慢差费地去进行一些研究工作罢了。

1934年北京大学毕业，我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先参加发掘殷墟，后整理殷墟出土的两万多片甲骨文字，条件总算不错。但对其他各机关单位所藏，不得而知，对于国外所藏，所知更少。也还是难于彻底地大搞科学研究。

60年后，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首先我们弄清楚了几十年来，甲骨文材料，发现的确不少。据1984年的统计，在国内有99个机关单位，47个私人收藏家，共收藏甲骨97611片。在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有9个机关单位，3个私人收藏家，共收藏甲骨30293

片。在国外有 12 个国家,共收藏甲骨 26700 片。合国内国外,公私收藏甲骨,共 154604 片,举成数而言,可以说全世界共藏甲骨 15 万多片。

值得兴奋的是,这些材料,除了最近发掘出土的甲骨还在整理之外,其余重要的绝大数的甲骨都已发表,极方便学习和研究的使用。我曾有《90 年来甲骨文资料刊布的新情况》和《详细占有甲骨文资料的大好时机》两文,就是谈论的这一问题。

1967 年日本岛邦男氏根据 65 种著录甲骨的专书,以 164 个部首,分字分辞,按原文字形将所有甲骨卜辞条列于下,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综辑甲骨文字的工具书。在今日看来,虽收书不够完全,但对学习研究还是极为方便的。

还有从 1961 年到 1983 年,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集中了十多位年轻同志,总合 180 多种著录甲骨文的著作和近 20 万片的甲骨文拓本,以及好多从没有著录发表过的甲骨文资料,经过辨伪、去重、拼合、换片、例聚、精选等一系列的科学整理,最后分期分类编成并出版了《甲骨文合集》一书,十三巨册,共选收甲骨 41956 片。关于释文和来源表早已编完,正在印刷之中。关于《合集》补正及续出各书,将编为《甲骨文合集补编》,这样就可以说真的集了甲骨文资料之大成了。

今天研究甲骨,就不会再像我们以前那样,千方百计地去找寻那 100 多种零零碎碎著录甲骨的专书;也不会再像我们以前那样,想尽一切办法,去搜索那尚未发表的实物和拓本。我在好多场合,曾对一些初学的青年朋友们说,你们今天研究甲骨,真是太幸福了,首先解决了一个资料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现在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就特别多了起来,尤其是 1978 年以后,国家改革开放,社会安定团结,新的甲骨文作家,风起云涌,好多青年学者都能写出专书和饶有创发的论文。

1978 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先后于 1978、1979、1980、1981、1984、1986、1988、1990 年,在长春、广州、成都、太原、西安、长岛、太仓等地,共开了八次大会,出席人数从 51 人到 148 人,论文从 33 篇至 123 篇。1984 年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先后于 1984、1987、1988、1989、1991 年,在安阳、洛阳,共开了五次大会,出席人数从 107 人到 135 人,论文从 60 篇到 109 篇。两个会议成员,除了一些老专家之外,都以中青年居多,论文中大部分都是有关甲骨学和商代史的著作。

1952 年 1 月,我出过一本书《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统计自 1899 年甲骨文发现至新中国成立这 50 年中,甲骨文的作家本国人 230 位,外国人 59 位,共计 289 人;论著专书 148 部,论文 728 篇,共计 876 种。1991 年 12 月,濮茅左同志出有一本《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统计了自甲骨出土 90 年来的论著,除了目录、序言、凡例和附录之外,单是论著目录就有 561 页,我没有数清共有多少作家,粗粗一算,连重复的论著在内,有著作总数就达几千上万条之多,约为前 50 年的 10 倍,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

因为初学的需要,一般总论介绍的论著,就应运而生,除了一些论文之外,专著有肖艾的《甲骨文史话》(1980),孟世凯的《殷墟甲骨文简述》(1980),吴浩坤、潘悠的《中国甲骨学史》(1985),王明阁的《甲骨学初论》(1986),范毓周《甲骨文》(1986),陈炜湛的《甲骨文简论》(1987)、王宇信的《甲骨学通论》(1989),不一而足,而且非常畅销。

另外像李学勤的《古文字学初阶》(1985),林沄的《古文字研究简论》(1986),高明



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987),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1988)和陈世辉、汤余惠的《古文字学概要》(1988)等书,也都涉及了甲骨文的研究。

又有像孟世凯的《甲骨学小辞典》(1987)、崔恒升的《简明甲骨文词典》(1992),以及在《甲骨学文字编》、《甲骨文编》、《续甲骨文编》以后重新编辑的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1965、1970)、高明的《古文字类编》(1980)、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1988),都是学者应该参考的著作。

1989年岁末,东北师范大学马如森先生持吾友孙晓野(常叙)先生手书及大作《古文字论文集》复印稿,嘱为撰著序文,老友盛情,极为可感!如森先生并有自著《殷墟甲骨文引论》(今修订再版改书名为《殷墟甲骨学——带你走进甲骨文的世界》,编者注,下同)一书亦请为写一序。余固辞不获,乃匆匆命笔草此序文。

如森先生《殷墟甲骨文引论》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甲骨文基本知识,由甲骨文之发现、收藏与著录,谈到甲骨文研究方面之主要问题,如甲骨之来源与占卜之方法,卜辞之分类与内容,以及缀合、断代、文字、书法等等,都予以详细之解说,条分缕析,颇有创发,并附有图表,以资参证。下编选甲骨文中1056个可识之字,从形、音、义方面加以简释,并附有辞条,以为说明,并有笔画查字表及汉语拼音索引,尤为方便。

我认为在目前甲骨学研究普遍展开的情况下,这是一本好书,对语文工作者,尤其对于中青年学者初学甲骨之人,是一本非常有益的著作。

故乐为之介绍。

胡厚宣

1992年7月22日于北京

胡厚宣(1911—1995),著名甲骨学家。曾担任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的总编辑,另有“甲骨文商史论丛”四集、《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集》等重要著作。

# 孙常叙序

马如森同志《殷墟甲骨学》书成，求序于予。予观近就谈文字者，每谈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之，以为有进一步是正之者，原语言文字发展之大概，就先秦文字而说之。盖先秦文字分真假文字——所谓“假文字”指图画文字，而真文字指能按语言的语序，逐词逐句，以记录语言之真字。而甲骨文字适当于初期文字，易于对照，随以论文字之发端。

汉语词汇书写形式学是汉语文字学。它和以汉字形体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汉字形体学”是不同的。因为它不是就字论字的字形学，而是从字与词、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关系，研究古今汉字的本质、起源、写词方法和发生发展客观规律，为研究古文字和汉字改革探索新的道路。

汉字是历史的，前后既有传承，古今又有区别，不能就其发展中的某一阶段来概括全程。大体上可分作两大段：先秦文字和秦汉以后的文字。这种相对地区分，并不意味着割断它们的历史联系，不影响它们都是汉字。

今天这里要说的，只是先秦文字部分中的一个部分——古代汉字的本质、起源和写词方法。

## 一、古代汉字的本质

汉语文字学者，往往是从形、音、义三方面来研究汉字的。甚至有人认为这三者是汉字的三个要素。

我认为这种看法，对古代汉字来说，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认为古代汉字不是由形、音、义三个各自独立的股合成的。它乃是古代汉语词和它的书写形式的对立统一体。也就是说，字是词的书写形式，而词是字所写的内容。

字形、字音、字义这三个观念由来已久，是汉语和汉字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产物。在先秦时代，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如此的。那时，还没有现代汉语“词”这个名称，而是把它叫做“名”的。写出来的“词”也是用“名”来计数的。“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仪礼·聘礼》），说明当时在人的思想中，并没“字”的观念，认为他们写在书面的语言单位，依然是“名”——“词”。写“名”的动作叫做“书”，写出来的笔划结体叫做“文”。从春秋时代人的“名”“字”关系，可知由“名”生出来的，用以代替原名，和原名起同样作用的东西叫做“字”。“字”是“名”的另一表现形式。“文”和“字”都是就“名”来说的。用现代汉语来说，它们都是从写“名”（也就是写词）而得名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从写“词”而得名的。



语言在发展，先秦书面语言，到汉代，和口头语言的差距已经使典籍中好多语言，特别是它的“词”，非加以注解说明是不可能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训诂之学随之而生。

书面语言特点，限定人要了解它就必须识字。怎么写，怎么读，怎么解，这一系列的语文生活实践，逐渐地形成了“字形”“字音”“字义”观念。“字”和“词”的关系随之淡漠下去。语言继续发展，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差距越来越大，形、音、义三个观念遂被稳定下来，终至使人只知有“字”，而不复考虑它的“音”和“义”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是要取消这三个名字，而是说研究汉字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如果用汉以后的观念来遮住视线，是不可能看到它原头和实际的。

说到这，无妨观察一下所谓“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的关系：

形与音相结，其性质近于乐谱上的音符；

形与义相结，其性质近于道路上的交通标志；

音与义相结，从语言来说，是词。

以甲骨文“车”、“马”（原文是甲文字形，见附字形表“1”、“2”——编者注，下同）两字为例。

用现代汉语来读，前者是 chē，后者是 mǎ。前者是一种乘物，而后者则是一种动物。它的字形反映了这两种客观存在在人头脑中形成的表象特征。见“车”（甲文字形“1”）说“车”，见“马”（甲文字形“2”）呼“马”，字形是和词相连的。如果把这两个字形去掉，而只说 chē，mǎ，还可以收到同样效果。这个“音”“义”结合体是词，而不是别的。可见所谓“字形”、“字音”、“字义”不是三足鼎立，而是词和词的书写形式的对立统一。

字音是词的语音形式，而字义是词义的内容。这是一个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字形是词的书写形式，而词是字所写的内容，这又是一个对立统一。

字是词的书写形式。就先秦文字来说，这应是古代汉字的本质。

把古代汉字的本质搞清，然后才有研究汉字的起源、写词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等等问题的基础。

## 二、汉字的起源

关于汉字起源问题，有种种说法。这里不能一一去说。

在考古工作中，我们不能见到原始社会器物上所画的人或物的图形，即使可以指出它画的什么叫出它名字，也不能贸然地判定那时已经有了文字。我们不能看到一个孩子能画出“龟”或“龟”（见附字形表“3”、“4”），其形和甲骨金文相同，便认为他已经有和殷周时代相同的文字。事实上许多尚无文字的民族，也都早已有图画事物的能力。

至于有“图画文字”的民族，他们是不是已经有了文字？

这就涉及到“图画文字”是不是文字的问题。

判定它是不是文字，须要明确什么是文字。

文字是写词记言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汉语，就汉语来说，要看它能不能按照语序一个词一个词地写话记言。能，便是文字；不能，那便不是。

从我国国内和世界各地已经发现的“图画文字”来看，它们都是画图示意，而不是写

词记言的。“写意”而不写话,并不是文字。“图画文字”和文字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交际工具。

但是,“图画文字”的画面一般是用两种图形组成的。一种是事物图形,一种是符号。它的图形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人们是可以见牛呼牛,见马呼马,见图知名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它不是文字?

问题在于它们只能勾画有形可画的词,对于那些无形可画的词是没有办法的。因此它没有按照语序写词记话的能力,只能用事物图形和符号的形象、位置、关系来表示某事某意。

见图知名是“图画文字”作图人用以示意,解图人据以言事的基础。这一部分形、名相连的事物图象是蕴毓在“图画文字”里的新质要素。

“图画文字”只能示意而不能写话,同一画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任意性比较大。作为交际工具缺陷是很多的。

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奴隶主为了他们的阶级统治,奴隶为了反抗他们的统治,记事记言都需要精确不移的语言记录。“图画文字”不可能完成这种任务。

为了寻求新的记言方法,在“图画文字”蕴毓着的看图知名,形名相连的写词因素的基础上,利用同音词关系,借有形以写无形,发明了“象声写词法”——借用别的词的图形来记这个无形可象之词,从而使蕴毓在“图画文字”中的新质要素发生质变,变成词的书写形式,创造出可以用来按照语序写词记言的真正文字。

原始汉字是作为一种写词记言的成套的书写体系建成的。

象声写词法是凿破混沌的开山巨斧,它开始废弃了画图示意的“图画文字”。

原始的汉字体系是以象形(物形)、象事、象意、象声四种写词法建成的。

原始汉字创建的时代,从殷墟卜辞看,至晚在夏代后期。因为“商代先公和先妣的庙号,自二示(示壬、示癸)和二示的配偶才有典可稽”。<sup>①</sup>

### 三、原始汉字的体系及其基础

从“图画文字”质变而成的原始汉字是以形象写词法形成体系的。形象写词法规定词的书面造形,而象声写词法也是在形象写词法的基础上成立的。

这种文字体系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

(一)形象写词法所勾画的事物形象是它所写词词义中反映客观事物的表象特点。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相同、环境相同、生活相同,在实践中得到的认识相同,这些区别于其它事物的表象特点,既是因词表意而赋形的客观依据,又是使人见形知词的共同基础。

但是光有这一点,还不能使形象写词法创成原始文字。

(二)起决定作用的是语言基础。古代汉语是具有单音缀的和孤立的两种特性的。它依靠语序和语言的对立统一关系来限定词义选择和语法功能。由于这种性质,才能使蕴毓在“图画文字”中的见图知名的写词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成为一形一词、一词一形,质变为词的书写形式。

<sup>①</sup> 于省吾:《释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见其《甲骨文字释林》。

#### 四、形象写词法的主要规律

以形象写词法创成的原始汉字体系，是按照一条基本原则，两条基本规律写词记言的。

基本原则是依词赋形。字是词的形式，词是字所写的内容。内容决定形式。词是音、义的对立统一体，而词义的基本因素之一是反映客观存在的表象。形象写词主要按表象特征——足以区别于其它事物表象的形象赋形写词。词是音义的对立统一体，因而所赋之形其作用是以形为主而音义并见的。

由于它以形为主而音义并见，才能利用“象声”写词法写那种无形可写之词。因为词虽然是一个音义对立统一体，可是形式与内容是有其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的语言对立统一关系中，借用来的词的书写形式是可以用它的语音形式来起作用的。

两条基本规律是：趋简、求别。

这两条规律是相辅相成的。趋简的同时，必须求别；简而不别，则将影响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效果。求别律并不是简化的反动——繁化。求别之字依然趋简。

从殷墟和先周甲骨刻辞看，求别律促使原始汉字四种写词法向前发展，开拓写词法门，加强写词能力。

以基本词为例，<sup>①</sup>有的词词义所反映的事物表象，其形可写，而其象易混。这类词，为避混求别，或加注物象以明之。如“员”、“眉”（见附字形表“5”、“6”）或加注借字象声以别之。如“旧”、“麋”（见附字形表“7”、“8”）。有的词词义所反映的事物其处可见，而其物难象。写这种词，则利用它所在物体图形，用指示符号来标出。如“亦”、“中”（见附字形表“9”、“10”）。象声写词法，借贷双方共用一形，容易混误。为了避混求别，若为贷方保留本词本字，则给借方借以象声之字加写义类之形，使之自成其字。如“贞”（见附字形表“11”、“12”）；也有用给借字加写标音象声字，从音节上作出标志，如“凤”、“风”（见附字形表“13”、“14”）。若使借方占有所借象声字，则为贷方本词本字加写义类，以补偿之，如“其”（见附字形表“15”、“16”、“17”）。

以派生词为例，<sup>②</sup>有的在词根字上加形以示新词义类。如“方”（见附字形表“18”、“19”、“20”、“21”）。有的在词根原字基础上变更部分笔划以示其词与词根的关系和区别。如“史”，“事、史、使”（见附字形表“22”、“23”）。

趋简、求别两条规律，使与古代汉语相适应的原始汉字四种写词法，在实践中得到补充和发展，从而确定了古代汉字的基本体系。

见图知名是“图画文字”看图说话据以言事的基础。这一部分图、名是蕴毓在“图画文字”里的新质要素。

“图画文字”是示意的而不是写话的。同一画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任意性是比较大的。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奴隶主阶级为了他们的阶级统治，奴隶们为了对抗他们的统治，

① 这里所说的基本词和派生词是就一定历史时期说的。它的派生词以后有许多又成了基本词。

② 罗振玉：《殷商贞人文字考·序》，玉简斋印本，1910年版。

记事记言都更要精确的语言记录。为了克服“图画文字”的缺点，寻找新的记言方法，在“图画文字”利用字蕴毓着看图知名的写词因素，利用同音词的关系，写那些无形可象的词，发明了“象声”写词法，借用别的词的图形来做为这个无形可象的词的书写形式，从而使蕴毓在“图画文字”的新质要素发生质变，变成词的书写形式，创成可以用来写词记言借有形以写无形的真正文字。

中国文字，就现在能掌握的最古体系来说，莫早于殷墟甲骨文字。马君如森致力于此道多年，颇有成就。最近自己独立著作《殷墟甲骨文引论》可取之处甚多，其特点如下：

一曰：将甲骨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就其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确实起了引论的作用。

二曰：精选甲骨文可识字，作了简明的形音义三方面说解，要而不繁。全书录了 1056 字，每字都附以甲骨文例句，便于理解和运用，它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三曰：适用方面比较广，诸如：语言文字工作者、文史工作者、大专院校文史教师和学生、中学语文教师和学生、书法篆刻工作者，有广泛的实用性。

晓野 孙常叙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 附字形表：



孙常叙（1908—1994），著名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著有《中国语言文字概要》、《钟鼎铭文通释》等。

# 李学勤序

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马如森先生任教育工作多年，从学于孙常叙先生，对殷墟甲骨文有深入研究。不久前我到长春，有幸与他相遇，蒙以新著《殷墟甲骨文引论》见示。浏览之下，深觉此书体例新颖，内容丰富，于综述前人成果时善于裁夺，抒发自己新见时力求矜慎，在同类书籍中能独树一帜。因此，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在书前写几句话。

殷墟甲骨为学者所知，迄今已有九十多年。专门研究甲骨的学科分支甲骨学，虽极专门，却早已成为一门显学，目前正处在发扬光大的阶段。海内外不少地方都有学者从事甲骨的整理探讨，出现了若干研究中心；各处大学培养的青年学者，更是人才辈出。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甲骨学论作发表，专著、论文兼而有之。即以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等学术团体定期举办的会议而论，每届提出的论文，常以甲骨学方面的为最多。这种情形，和以前甲骨研究号称绝学的局面，可说适成鲜明的对比。

有关甲骨的一些知识，已经在社会传播得颇为深远。我们国内的中小学课本里，即包括着这方面的记述。甲骨的研究受到大众的关切，许多门类的书刊，只要与古代有点关联的，一般总会涉及甲骨文。这是由于甲骨文时代古远，内涵丰富，谁如果想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有所讨论和追溯，自然不能不涉及甲骨文。不仅在国内如此，外国出版的世界考古学史，例如1981年英国丹尼尔的《考古学简史》，同样要给殷墟甲骨的发现研究以一定位置。至于概论各国古文字的书籍，例如1989年美国森纳的《文字的起源》，更是不必说了。

虽然甲骨学已经兴盛，有不少学者潜心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文献，但这并不是说殷墟甲骨业已了无余义，没有多少可研究的了。实际上刚好相反，甲骨还有好多带有根本性的疑难问题，到现在仍未获得解决。有志于研究甲骨的学者，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正是大有用武之地。前些年，我在小著《古文字学初阶》中，曾谈过继续探索甲骨的几点设想。其间关键的一点，我认为是要在研究中真正充分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具体说来，我觉得眼前的急务还是要做基础性的工作，从而开拓甲骨研究的新局面。

基础性的工作，要言之不外三点，就是：分期、释字和卜法文例的研究。

甲骨和其他考古发掘所得遗物一样，在研究中必须进行整理分期。没有适当的分期，十几万版甲骨文只能是混沌一片，无法用于历史的研究。董作宾先生《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篇名文的功绩，便在于凿破混沌，在田野工作的引导下，确立了分期的框架。几十年来，随着田野工作的进展，学者们对董说有所修订，但分期工作的方向是没有改变的。分期中新提出的系列问题渐得解决，对甲骨文以及古代历史文化的探索大有裨益。

甲骨的研究不限于释字，可是文字的释读究竟是研究甲骨文最必要的工作。甲骨文已

经发现了多少不同的字，至今尚无精确统计。可以肯定的是，确实已经释读出来的字，只不过是几千个字中的一小部分。特别成为障碍的是，有一些经常遇到的字还不曾释读出来，或者释读是错误的，这当然不利于甲骨文的理解。1979年我举过“酃”字为例，这个字今天还是没有释读出来。

卜法文例也是极重要的。甲骨文是卜法的记录，不知道怎样进行占卜，就不能正确认识甲骨文的内容。卜法即用龟甲、兽骨占卜的方法，在中国数术中起源甚早，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卜法在历史上多有变迁，古代的占书多已佚失，以致我们在研究上没有什么依据，只能较多地依靠甲骨实物现象的归纳。最近对西周时期、战国时期若干卜辞的研究，对殷墟卜辞的了解颇富启发。看来这方面的深入探讨，确是大有可为。

要迅速推进上面所说的种种研究，现有甲骨学的研究力量仍是不够的。如果说到根据甲骨文大规模地开展古代历史文化的探索，那便需要更多的学者同心协力。甲骨学已经取得的种种成果，也应进一步普及到社会中去。为此，我们迫切需要有更多更好的通论性著作，使开始着手甲骨研究的学者得以遵循，非专业的读者也能有所借鉴。马如森先生的这部《殷墟甲骨文引论》正适应这样的要求。读者不难发现，我们提到的分期、释字、卜法文例等问题，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说明介绍。书的下编“可识字形音义简释”，简明扼要，尤便于初学的读者，值得在这里向大家推荐。

再过几年，就要到殷墟甲骨发现的一百周年了，这是学术界极其应该纪念的大事。相信到那个时候，甲骨学将以更兴旺、更发展的面貌步向21世纪。《殷墟甲骨文引论》这样的通论专著，对促进甲骨学的繁荣一定会起很好的作用。

李学勤

一九九二年夏于北京

三位先生的《序》，是为《殷墟甲骨文引论》（以下简称《引论》）所作。上海大学出版社为适应“中国殷墟丛书”的需要，将书名改为《殷墟甲骨学》出版。小著《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以下简称《释译》）是在《引论》基础上写成的。

《释译》所遇疑难问题，是从先生的大作中得到回答：

胡先生释“往”为逃亡，释“𠂔”为奴隶，释为粪，为释尿，提供了左证；孙先生释“冒晦”、“各云”，为天象用词的积雨云，释“十又二公”之后为秦景公；李先生释人名不其为秦庄公，白氏为其兄，释商王武丁伐畎使之灭亡，并为解除《矢人盘》疑难问题之多。上述先生的论及均在本文“注”中有详细的引用。

以上足以说明“三序”不仅指导了《引论》，同时也指导了《释译》和《商周铭文选注译》，故将三序录之如此，以敬重先生的教导，并深表感谢！（笔者）



# 自序

本书开始写作于 2001 年，之后几年中陆续修改。在写作的过程中，所遇问题不少，其中之一是对“先秦文字”的性质认定问题。先秦文字的时间大约有 3000 多年，包含殷商、西周、春秋、六国文字、秦系文字。我们明确了先秦文字的范围，如何理解这段中国古文字阶段的汉字，是十分重要的。对这一问题若没有个明确的认识，下一段工作将产生很多困难。

其一，我是在老师孙常叙先生的《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以下简称《文集》）中得到解决的。《文集》有两篇关于文字学的文章：《从图画文字的性质和发展试论汉字体系的起源和建立》、《假借、形声和先秦文字的性质》。

孙师是以词汇书写形式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讨先秦文字的性质，从词汇书写形式学来考察“它不是表音文字”。其根据是什么呢？

老师说：“先秦文字是适应当时语言特点，在图画文字蕴毓的写词因素基础上，以发明象声写词法使那些因素质变为形象写词法而创成。它的体系是以象形、象事、象意三种写词法和借用它们而成的象声写词法构成的。四者相依为命，缺一不可。可见先秦文字不是表音文字。”（《文集》第 490 页）

象声写词法，在先秦文字体系发展中，又分为假借和形声。它在先秦文字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而构成孙师打破许慎不能完全适用于先秦文字体系的“六书说”，而建立他的适应先秦文字体系新的“六书说”——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假借和形声。根据这样的文字体系，先秦文字的性质，老师确定它是形象的音节表意文字。而对甲骨金文来说，正是体现了这种文字性质。老师的结论是：“商周两代的书面语言，不论甲骨刻辞或青铜器铭文，都是用形象的音节表意文字书写的。”又强调说：“以商、周青铜器铭文和商代的甲骨刻辞为代表的古汉字是用形象写词法，就词义中足以和其他词互相区别的形象特征来构形的。这种文字体系是一种形象的音节表意文字。后来，由于它的结构、书法和应用的矛盾，在使用中逐渐简化，终至质变，成为一种不象形的，属于符号性的音节表意文字，从而形成了现行汉字。”（《文集》第 467、459 页）这一新的文字学理论的建立，是解释所有先秦文字的一把钥匙。我在注释本文时，就是运用这种理论进行的。由于本人理解有限，可能在运用此“六书”时，有不当之处，有待指教。

其二，解决注释疑难辞句问题。《文集》甲骨文研究有两篇文章，其中的《释𠩺——兼释各云、殷𠩺》。是对《合》10405 片反二辞的考释。其中反应天体云气有两个疑难辞句“𠩺母”和“各云”。该片卜辞记载了，完全符合天象自然规律，形成彩虹的全过程。表达云气“𠩺母”和“各云”，诸家各有解释。孙师释“𠩺”为“冒”，用殷墟出土的铜头盔——胄，来

作证（见《文集》第3-7页）胡厚宣先生补充，这种青铜冑，正是1934年他参加的发掘殷墟1004大墓时出土的，大约有六七种，200多个。“释为冒，以铜冑为证，非常正确，极为稳当。”（见该书胡《序》第2页）冒，在此有覆盖之意。释“母”为“晦”。《说文》：“晦，月尽也。”意谓天气昏暗。释“母”为“冒晦”，由单音节词变为双音节词。表明天上阴暗的云层往下覆盖，是造成出现彩虹的必备条件。

“各云”，“卜辞的‘各云’当是直展云族属下的积雨云。”（详见本辞注④）老师总结这段文义说：“这种自上向下蒙覆之义，在这段卜辞中，使‘冒’和它前面‘有各云自东’的‘各云’——底部十分阴暗的积雨云相互依存，取得对立统一。”（《文集》第12页）日在西方，日光反射于东，东方出现彩虹。“出虹”和“各云”有依存关系。这一事实，也是“各云”为积雨云的一种内证。解词和释义的统一，使这段疑难辞句，得到完美的解决。

此次增补之金文，其中《天亡簋》和《召鼎》，诸家各述已见，论证翔实。对其注释和译文，我也是以孙师的学术观点和先生对两器有关考释的结论，解决了我的疑难辞句解释的问题。

其三，以前出版的《殷墟甲骨学》、《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出乎意料地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应用。河南安阳，浙江杭州，山东济南、烟台、威海等地有好多热爱甲骨文的同志热情购买《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的情景，使我久久不能遗忘。这一切使我深受感动，也得到鼓励。这说明古文字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这是古文字学在21世纪的一大特点。汉字的“根”，来源于古文字，不论研究语言文字还是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关注对古文字研究的重要性。古文字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若是离开传统文化，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基于此种需要，也为有助于这方面的学习，所以此次又作增补。从“金石学”而论，甲骨刻字文字，亦属“铭文”，故书名曰《商周铭文选注译》。

我们在市面上所见有关甲骨、金文著述众多，亦有这方面的字帖，甲骨文以大片为主，金文有《大盂鼎》、《矢人盘》、《虢季子白盘》和《毛公鼎》四大器。但有的帖只有拓本，没有注释。本文选入甲骨文以一期大字刻辞，9篇。金文除以上4器外，增加13篇，总共是28篇。从时间看，甲骨文，一期和五期，金文，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

我在上述写作目的前提下，确定本文的写作方法，很难做到的，我尽力做到知识准确、有一定科学性，以防止误导，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以铭文为基准，在此原则下，采用译文与铭文对译的方法，把译文写在铭文的下方，看到译文就会知道铭文的原义。铭文的古义和今义很复杂，除其本义之外还有引申义和假借义。于是在原文大字之间加上小字作注，一目了然，在注释中再加详注。

甲骨文字形与现今汉字字形距离很大，把甲骨、金文字形用剪贴方式，与现今汉字相对照，加以注释，以达到释懂原文的目的。

其四，特别要表示敬意的是，李学勤先生非常关心、支持、鼓励后学人。回想1992年先生为拙作《殷墟甲骨文引论》作序，给予小著很高的评价。拙著在社会上得到好评和广泛的应用，和李先生的教诲有直接关系。近于20年后的今天，又将近写小著《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书稿呈给先生，再次烦请写序。先生在百忙中通审全书，并再次审述，多加勸勉与教诲，实有深感，受之有愧。在此向李学勤先生深表感谢！本书又是前书的增补本，故将先生的《序》文列为本书之首。

其五，本书之所以出版，是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旭先生策划与指导下完成的。

我非常敬佩先生致力我国古文献方面的出版，宏扬我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这是我第五次感谢他。第一次是2007年1月出版《殷墟甲骨学》；第二次是2008年4月出版《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第三次是2010年4月出版《甲骨文书法大字典》，第四次是2010年11月出版《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商周铭文纯属先秦文字的性质，都存在古奥难懂的个性，对我来说，只是作初步的尝试。这个尝试的实现，来之不易，是自“中国殷墟丛书”决定出版之后，是副总编辑李旭先生支持的结果。该书的出版又得到上海大学出版社社长郭纯生先生和编辑庄际虹女士的支持。出版科章斐老师及制版公司的同志克服许多困难，将正文释文手写字改为宋体打字，使得文字形式与铭文内容完美的统一，便于读者阅读，加强了实用性。在此一并致以谢忱。在增订写作过程中，文学院资料室工作的女儿马囡，为我提供资料，整理核对文稿，作了许多工作。在注译文时，虽说遵用先师和现当代学者诸家考证之言，但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我诚恳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同仁师友和专家批评赐教。

马如森

2011年11月18日

2012年7月10日修改

于东北师范大学